

您的位置: [首页](#) >> [阅读文章](#)

阅读文章

Selected Articles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 187

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薛其林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和转型的时期。其中,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与新学术范式的确立,是民国学术最主要的特色与成就。

古今中西融合创新

民国时期学术的背景是内部的社会转型和外部的西学东渐,特点是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碰撞交汇与融合创新。

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融合而成科学实证方法。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传入后,即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普遍的。就学者而言,几乎每一个有成就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传统学术藉此机缘也勃发了生机:墨学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乾嘉考据学再度风行;冯友兰、金岳霖融会中西、推陈出新,构建起学术体系;王国维、陈寅恪等兼用实证方法和传统考据方法,在各自学术领域作出了骄人的成就。(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相契合,作为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论原则在民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并沿着政治和学术两个方向发展和深入。学术界以此为指导建立起了全新的学科门类和方法论体系。(三)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义理阐释方法兼取富于理论色彩的西方诠释学与富于实践色彩的中国义理学的长处,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和双向回流的思维方式解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为融合中西提供了新的思路。(四)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融合而成直觉方法。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现代新儒学扬波而起,或从文化路向不同来反对科学一元论(如梁漱溟),或认为人生观问题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如张君勱)。他们借鉴西方柏格森创化论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来阐述中国的道德哲学,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体念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勱讲非理性的直觉(受柏格森的影响),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从谢林得到启发),再到牟宗山讲智的直觉(改造康德的观念),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在上述四种主流方法中,科学实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

新学术范式确立

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与规模;反过来,西学东渐则加速了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笼统而言,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科发展,中西会通创新等等,都标志着民国学术范式的确立。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新话语模式的确立。民国学人大都把语言与思维放在一起来

更多▲

特聘专家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走进国际法中心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思考问题，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发起的文学革命，从工具理性出发，以白话文这一新形式来灌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容；以革新的语言工具——白话文来建立“活的文学”；以革新文学内容——文学革命来建立“人的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全新工具和武器，白话文极大地推进了启蒙文化运动，不仅扫荡了陈旧的话语模式，确立了新的话语模式，而且为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提供了前提。（二）新思维模式的确立。民国时期确立了两种新的思维模式：一是对科学的崇拜；一是对哲学的高度重视。这种思维模式反映了当时的人们追求一种完整的认识以及追求完美的理论的倾向，它促使人们去建立历史观来研究哲学问题，并根据哲学认识来建立各自的学理及学说。（三）新学术精神的确立。民国时期学术上确立了怀疑和实证两种精神：首先是怀疑精神。“怀疑”从认知思维过程的那种被压抑的萎缩中张扬跃动起来，成为认知过程发生的启动点，由怀疑而产生批判，由批判而产生扬弃。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在五四前后引发了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由康有为开启端绪的

“疑经”，经严复、胡适从学理上、致思上的疏导和升华，发展而为顾颉刚的“疑古”，怀疑精神达到高潮。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开辟了许多全新的学术领域，确立了崭新的学术范式。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就是典型例证。其次是实证精神。西方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实验主义经严复、胡适等人的引进，在五四时期蔚成风气。一切“心成之说”都要接受科学实证方法的严密验证。由怀疑而“大胆假设”，由实证而“小心求证”，从而使学术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基础之上。

伴随新范式的确立，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群体和大量学术著作。其中，不少是确立新学术范式的开山之作。例如，学术史上最为称道的“三史”（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的哲学史体例；以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学术史体例；以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代表的思想史体例）即是典型。再如，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中国论述逻辑学和哲学方法的开山之作。又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以关注生活、时代、社会为特色的唯物史观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他如现代考古学学术群体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像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等都是典型代表。

《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 100720

[RSS](#)